

劳卡纳：在利马的人民委员会

国际日报（秘鲁）*

2019年8月24日

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

编者注： 《国际日报》是秘鲁右倾投降分子的报纸。

劳卡纳，作为秘鲁共产党人民委员会(PCP)的城市经验而载入史册，该委员会也被媒体称作“光辉道路”。1990年7月28日，在阿特-维塔特地区，移民者占领了富裕的伊索拉家族旧庄园的土地，随后设立了移民安置点。警察用血和火阻挠了对土地的占领，造成三人死亡。第一个是24岁的公民菲利克斯·豪尔赫·劳卡纳(Félix Jorge Raucana)。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开拓者，这个定居点以他的名字命名。直到1991年，有1600至2000名居民住在劳卡纳(Raucana)，其中一半年龄在21至40岁之间。

PCP帮助人民建立了一个类似于人民委员会的集体组织制度。由于其近乎完美的运转和与该党的密切关系，劳卡纳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在右翼的每日报刊Última Hora上，可以读到以下关于劳卡纳的内容：“它所占的面积约215公顷，错落有致。每个人都为所有人工作，相互合作，组织得力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以物易物制度没有失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园，每个菜园里种植不同的蔬菜，从而获得不同的产品，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，供小组进行交换。他们有运动场，能制作砖坯，他们十分团结。（Última Hora，卡洛斯·卡斯蒂略2006年引用）。

通过集体组织，居民可以解决贫困问题。他们建造房屋，在没有机器帮助的条件下挖水井，建菜园和果园，建造动物农场以自给自足。他们建造了一个给排水系统，并有一家药店向村民免费提供药品。他们设立了一个医疗站，医学生在那里照顾村民。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帮助，不求任何回报，并每月缴纳安置费。

那些没有钱的人可以提供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劳动作为报酬。

劳卡纳有一个由代表委员会行使权力的司法自治制度。在公审下错误和罪行一览无余。当一个村民违反人民的良好行为准则时，例如虐待他的妻子或孩子，或对他的邻居有不尊重的行为，他就会受到警告。如果他不改正，他就会被带到大会去接受惩罚，惩罚一般是为社区工作几个小时。劳卡纳当局和成员与其他定居点接触，以解决

他们的内部安全问题。

此外，还建立了自己的安全制度，以确保公共秩序，并防止出现在其他城镇那样的强盗或贩毒团伙入侵。防御系统负责击退最初试图驱逐居民的警察的攻击。有了这个自我管理组织，劳卡纳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模范定居点。对于那些梦想建立一个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新社会的人来说，这里正在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雏形。

劳卡纳被分成不同的区域，这些区域举行会议，并选举一名代表参加大会，为整个定居点作出决策。大会成员由代表委员会选举产生。青年和儿童可以参加大会。村民们可以提出行动建议，由代表们和大会进行讨论。这确保了每个人都能参与决策。劳卡纳是直接民主的一个例子。

根据历史学家卡洛斯·卡斯蒂略（Carlos Castillo）的说法，代表和大多数劳卡纳人都不是 PCP 的成员，但他们尊重大会和代表的决定。真相委员会的受访者保证，没有人被迫加入或支持 PCP（真相委员会 2003，第 5 卷，第 442 页）（Castillo 2006:114）。

秘鲁共产党也没有明确承认它在劳卡纳执政。然而，一切都证明劳卡纳当局是一个履行了委员会的职能，并且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人民委员会。这是非比寻常的，因为人民委员会成立于农村。PCP 实施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。人民的力量应该在这里组织起来，以便在第二阶段包围城市，在经济和军事上窒息它们，直到最后吹响进攻的号角（1）同时，应该在城市中创造条件，创造政权空间。在这一战略中，人民居住区，贫困社区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媒体称他们为“贫困带”。共产党反而称他们为“铁带”（2）

秘鲁当局既不宽恕共产党，也不宽恕劳卡纳的居民：它必须摧毁这个定居点，不仅因为共产党庇护了一个“恐怖分子”的温床，而且因为它证明了 PCP 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效的。社会主义确实存在，而且在实践中优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官方。

1991 年 9 月 6 日，一支由 2 000 名士兵组成的特遣队占领了劳卡纳，他们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，并在那里驻扎了 10 年。占领是血腥残酷的。士兵和警察组成的联合突击队对所有房屋都破门而入，抢走并摧毁人民的财产，逮捕、拷打并且造成多人失踪。军方杀害动物以摧毁果园和农场（真相委员会 2003，第 5 卷，第 444 页）。很明显，军方想要摧毁居民赖以生存的资源 and 劳卡纳项目。几名妇女报告说，她们受到士兵和警察的虐待和强奸。1991 年至 1993 年期间，所有当选的大会成员都被逮捕。甚至在占领之前，也就是同年 4 月，在人民抗议逮捕领导人时军方杀害了 4 名村民，打伤了数

十人。真相委员会将这些谋杀、失踪、酷刑和肆意逮捕一一记录；然而，真相委员会却致力于诋毁共产党，并在政治上洗刷军队、警察和朗达成员（富农地主巡逻队）的战争罪行。

记者卡洛斯萨维德拉（Carlos Saavedra）在接受采访时说："1991年，当军队准备夺回光辉道路成员居住的劳卡纳社区时，我腿部中弹。这是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战斗。军队驱逐了媒体和警察。我固执地闯入，随后战斗就打响了，这是多么勇敢。我在水泥地上找到一个方形的散兵坑，来到村子的另一边，看到人们中枪倒地。我拿着相机站着，随后我感到一阵摩擦灼伤了我的腿；但是子弹没有落在我身上，它杀死了我身后的一个人。"（IDL-Reporteros2010）。

占领军摧毁了人民的社区组织以示惩戒，迫使人民反而依赖他们提供的粮食援助。这是当局在与PCP的战争中使用的古老的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策略。多年来，军方一直在定居点分发粮食，以赢得支持，从而使他们远离毛派游击队。在劳卡纳的例子中，情况有所不同，军方迅速减少了粮食援助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赢得民众的支持。他们是对的，因为人民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。

历史学家卡洛斯·卡斯蒂略记录了军队对劳卡纳居民的系统性虐待。这个军事基地在那里保留了10年。军事占领阻止了村民们继续组织起来。它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定居点，卫生条件落后，人民忍饥挨饿并且饱受慢性病的折磨。1998年，《共和报》（La República）对劳卡纳的报道如下："没有食物。生病的孩子、肺结核的孩子、营养不良的孩子、酗酒者和单身母亲比比皆是。劳卡纳，“光辉道路”在首都建立了第一开放的人民委员会的城镇，人间地狱.....但是八年来，哈拉斯（Haras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豪尔赫·费利克斯·劳卡纳社区，成为了利马最悲惨和可恨的社区之一。"（La República 1991年8月9日，卡斯蒂略2006年，第264页）。

作者记录了许多村民的心理问题，儿童也苦于先天性畸形的折磨。当局采用哲学家迈克尔·福柯（Michael Foucault）所定义的生物政治学，即通过控制身体来统治。当局的目的是摧毁劳卡纳人民的斗争意志，并剥夺他们的生存手段，为他们的疾病创造条件。因此即使在PCP失败后，当局依旧继续折磨人民。

我们要强调的是，没有人因这些罪行而受到审判，也没有士兵和警察因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人民而受到审判。这些人失踪、惨遭酷刑和强奸，没有任何人权组织提出抗议，真相委员会也没有努力调查和起诉此类案件。在目前的政权结构下，这个社区的正义还没有到来，也不会到来。

作为人民战争历史中，最具启发性和最有意义的经验之一，劳卡纳的经验被载入史册，因为它证明只有通过团结奋斗，人民才能挣脱压迫的枷锁解放自己。劳卡纳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勇敢的人民为秘鲁争取更公平的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的经验和斗争是社会主义漫长道路上无法磨灭的贡献。他们的英勇奉献永远不会被忘记。历史将给予他们应有的应有的地位。

注

(1) 如果我们将此扩展到文学领域，可以引用何塞·玛丽亚·阿格达斯的著名诗作，“TúpacAmaru Kamaq Taytanchisman Haylli Taki”（致我们的创造者之父 Túpac Amaru Himno-Canción），摘自他唯一的诗集《Kakatay》和其他诗集（1972年：最初写于盖丘亚语）；从文学上再现了在该国首都包围省份移民的历史。此外，这首诗不是对毛主义战略的解释-因为没有论据证明这些与阿格达斯的关系。
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秘鲁共和国克里奥尔人在不同环境下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依旧保持目标一致。

2) 在这方面，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理论中，突出语言和象征层面的政治斗争。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一样，还有其他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举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：秘鲁政府关押政治犯的肮脏监狱（顺便说一句，与对待其他囚犯一样），”光辉道路”成员将其重新命名为”明亮的战壕”（LTC）。

例如，这导致了一场大屠杀，就像艾伦·加西亚（Alan Garcia）第一届政府时期发生在监狱里的大屠杀一样，被重新命名为”英雄日”。符号学家胡安·比昂迪（）Juan Biondi）和爱德华多·萨帕塔（Eduardo Zapata）的开创性著作《光辉道路的话语：教育文本》（利马，1990年）探讨了那些年文化教育领域中，语言层面上的这种象征斗争。

资料来源：

Arce Borja (2009) 《战争记忆》 秘鲁 1980-2000

卡斯蒂略·瓦尔加斯（Castillo Vargas），卡洛斯（Carlos）（2006）《打破沉默》 劳卡纳，可能依靠秘鲁共产党的支持的历史，“新力量”的形成方式

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（2003年）。《最终报告》第5卷

IDL-Reporters (2010) 《摄影的忍者》